

周易
古代中國的世界圖示



烏恩溥

周易
古代中國的世界圖示

Zhouyi—Gudai Zhongguo De Shijie tushi

周易——古代中国的世界图式

乌恩溥 著

责任编辑：李本达

封面设计：朱孝达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 6印张 4插页 146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印数：1—7,700册 定价：1.8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 7—80528—00—1/K·26

前　　言

《周易》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两千多年来始终受到人们的重视。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删定六经，《周易》就被列为六经之一。战国到秦汉之际，一些儒家学者对《周易》做了全面的探讨和研究，撰写了《易传》十篇，为后世学者研究《周易》奠定了理论基础。汉代传授易学的，已经分为施雠、孟喜、梁丘贺、费直、京房等若干家，形成了几个学派。东汉时期，《周易》被道家所接受，作为道家炼丹的理论指导。魏晋时期，《周易》被列为“三玄”之一，在当时的思想界发生过巨大的影响。宋明时期，宋明理学家和心学家对《周易》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阐发，《周易》对宋明理学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了现代，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世界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周易》的学者愈来愈多，以致《周易》一书在西方世界风行一时。人们发现《周易》一书的二进位制数学和现代的电子科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周易》一书对于现代科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受到学术界广泛的重视。

《周易》在古代被视为卜筮的书。古代的人们遇有征伐、祭祀等国家大事，或商贾行旅、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日常生活事件，都要进行占卜。通过卜筮，探询上帝或神的旨意，判断吉凶，以决定行止。这种活动，从表面上看，它所指绎的是人事的吉凶祸福；但是，另一方面，从本质上讲，这种

活动是求其本原于天或天道。古代的人们认为：人事的吉凶祸福，从根本上说，都本原于天。人类的一切社会行为，都不能违背天地的大法，都必须遵循天道运行的规律行事。这就是说，在卜筮活动的背后，深深地蕴藏着古代的人们对于天道运行规律的认识，深切地埋藏着古代的天道观。从这个意义来说，《周易》自古以来就是一部哲理的书。《周易》一书通过卦、卦辞和爻辞这种特殊的形式来反映古代的人们对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的根本观点，反映着古代人们的自然观和社会政治观点、伦理道德观念。总之，一句话，反映着古代人们的世界观。

《周易》作为一部哲学著作，和古代科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的人们在生产和社会生活实践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科学知识，形成了诸如农学、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医学等门类众多的科学学科。这些学科的形成，为《周易》一书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周易》本身不仅是一部富于哲理的书，而且包含着数学、天文、历法等多方面的内容。这说明《周易》是在古代的人们所取得的科学成就的基础上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有着丰富的科学内容。从这个意义来讲，也可以说《周易》是一部具有一定科学内容的著作。

虽然如此，《周易》在古代还是充满了浓厚的神秘色彩。古代的人们在宗教迷信思想的支配下，或者制造了诸如“河出图”、“洛出书”等种种神奇的故事加到《周易》的身上，把《周易》说得神乎其神；或者把伏羲、周公、孔子等古代的“圣人”请出来，为《周易》装璜门面，借以扩大它的影响并提高它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为《周易》的研究工作带来了一些难题，增加了一些困难。今天，我们应该拨开这重重迷雾，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对《周易》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和研究。剔除其宗教迷信的糟粕，吸收其科学的民主的精华。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使《周易》这部古老的哲学著作，重新放射出光芒，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易的时代	(1)
第二章 易的起源	(12)
第三章 易的世界图式 (上)	(24)
第四章 易的世界图式 (下)	(34)
第五章 易的内在结构 (上)	(46)
第六章 易的内在结构 (下)	(61)
第七章 易和算学	(75)
第八章 易和天文历法	(89)
第九章 易和律吕	(104)
第十章 易和方技	(115)
第十一章 易和社会生活	(131)
第十二章 易 传	(146)
第十三章 易和卜筮	(164)
后 记	(181)

第一章

易 的 时 代

《周礼·春官·太卜》记载：“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这就是说，《易》在西周以前有三种，一是连山，一是归藏，一是周易。按照传统的说法，《易》在夏代叫作“连山”，因为六十四卦的首卦是艮，艮象山，所以叫作“连山”。《易》在殷代叫作“归藏”，因为六十四卦的首卦是坤，坤象地，是万物归藏之所，所以叫作“归藏”。《易》在周代，叫做“周易”。现在连山、归藏都已失传，只有《周易》流传下来了。

《周易》的“周”字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周”字是指周代，一种解释认为：“周”字是周遍的意思。现在一般地都采用前一种解释。“易”字是变易的意思。《周易》一书成书于周代，是反映宇宙的大化流行，即客观世界的运动、发展和变化的，所以人们称为《周易》。

易作为变易的观念，在中国产生的很早。早在殷商时代就已经有了这种观念，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易字象形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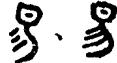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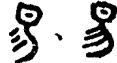


，表示双手捧一盛水的器皿，将水倾注到另一器皿的

情状。后来把双手省略，作 ， 表示一器皿向另一器皿倾注水的情状。甲骨文通过两个器皿之间水的“裒多益寡”，表示出变化、变易的观念。易字在甲骨文里，字形构造的本身就包含着变易的含义。西周时期的金文，易字作 ，或作 ，表示水由一个器皿中流出。金文较

甲骨文虽然省略了一个器皿，但是，它的含义是相同的，也是表示变化或变易的意思。从文字的起源来考察，早在殷周时代变易的观念就已经产生出来了。

春秋战国时期通行的篆文，易字写作 、，这是由金文进一步省略演化而成的。原来金文 ，省略其盛水器皿的一部分，截取其一角遂成为 ，更进一步演化成 ，

最后形成大篆的 、 字。关于易字的解释，许慎引古秘书的记载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这是说“易”字是由日、月两个字组合而成的。易的上部是“日”字，象征阳；易的下部是“月”字，象征阴。易字本身包括一日、一月，象征着阴、阳的消长和变化。这种解释虽然距离甲骨文中“易”字的原始含义已经相去很远了，但是，它带有抽象的哲理意味，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宇宙变化的认识。《系辞下传》说：“天下

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第五章），古代的人们认为：日是阳气的最精者；月是阴气的最精者。宇宙万物都是由此阴阳二气发生出来的。《周易》就是通过阴阳的变化，以观察天时的变迁，并进而预测人事的吉凶祸福的。古秘书关于篆文“易”字的阐释，是当时的人们对于宇宙变化观念的概括反映。

在汉代《说文》注释“易”字说：“易，蜥蜴、蝘蜓、守宫也，象形”。汉代的学者认为：易字是取蜥蜴、变色龙、爬墙虎等动物的形象造成的字，这样来解释“易”字的象形来源，距离甲骨文的原始含义相去就更远了。变色龙是产生在非洲北岸的一种小的爬行动物，栖息在岩石之间。它的身上具有各种色素，可以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一天之内改变十二种颜色。秦始皇时，有人将它进贡到宫中，秦始皇命它看守宫中的钥匙，据说没有人敢私下开启锁钥的。因此，人们称之为“守宫”。汉武帝时命人将“守宫”放在盆里，用筹之类的东西射击它，据说没有人能够射中它。方术之士将守宫放在器皿里，用丹砂来喂养，它的全身变成赤色。另外，蜥蜴，古代的人们认为：它能够吐雹祈雨，所以有“龙子”的名称。总之，古代的人们把蜥蜴、变色龙、爬墙虎之类的小动物视为“神物”，以为它们能够测知阴阳的屈伸和消长，所以用蜥蜴、蝘蜓、守宫来解释“易”字，以此来表达变易的观念。

上述这些都是从文字起源这个角度来阐述“易”字的含义，虽然由于时代的变迁对于“易”字的起源的解释产生了几种不同的说法，但是，有一点却是一致的，这就是“易”字是表示“变易”的。变易的观念自古及今是始终一贯的。

从文字起源来考察，“易”字只有一个含义，这就是变易。这是“易”字的根本含义。随着易学的发展，随着易学理

论体系的完善，古代的学者们对于“易”的含义又从理论上做了阐述和发挥。《易纬·乾凿度》：“易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这里提出的“易”的三个含义是：易、变易、不易。易，又称交易。《易纬·乾凿度》在解释“易”时说：“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简易立节”，这是说所谓“易”或“交易”是就易的德性而言的。阳的德性是“先与之，后取之”，阴的德性是“先取之，后与之”。阳作为宇宙万有的根本，首先将其元素散发与阴，阴收受之，进行生育蕃衍，然后再返还与阳。在“取”和“与”的关系上，阳和阴的属性是相对立的。阴与阳相对待，所以又称“交易”。在解释变易时，《易纬·乾凿度》说：“变易者其气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所谓变易指的是阴阳二气的交感和变化。离开了阴阳二气的交感、变化，宇宙万物就不能生成。在解释“不易”时，《易纬·乾凿度》说：“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这就是说天高地卑的位置是永远也不会变的。郑玄本着《易纬·乾凿度》的这个说法作《易赞》和《易论》。他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郑玄所说的“易简”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宇宙间极复杂的现象，都由《周易》这一极简单的原理概括无遗了；一是说“易”的道理是简单明了的，是最容易把握的。所谓变易，是指宇宙间一切现象无时无刻不处在流动、变化之中。所谓不易，是指“从至变之中，籀得其不变之则”，这是说宇宙万象不论如何变化，总有一个根本不易之理在那里制约着，统驭着。《易纬·乾凿度》和郑玄从理论上对“易”的含义作了阐述和发挥。这种阐述和发挥揭示了《周易》的变易观所包含的三个方面及其内容，反映了《周易》的变易观的历史发展过程，同时也反映了《周易》的变易观的实质及其历史局限性。这一阐述无疑是正确的。

的。《易纬·乾凿度》和郑玄的论述一直沿用到今天，成为人们研究《周易》的有力依据。

关于《周易》的作者和时代的问题，按照传统的说法，是伏羲作八卦，文王重为六十四卦，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由于周公是文王的辅弼，所以有时只提文王，不提周公。伏羲作八卦的说法，盖出自《系辞传》。《系辞传》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到了后世这种说法遂被视为定论了。至于文王作重卦的问题，《系辞下传》这样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也。”这里只是说《周易》的兴起大约在殷末周初的时期，作《周易》的人可能是一个处于困境的人，而没有说重卦为文王所作。关于文王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的问题，《史记·周本纪》说：“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日者列传》说：“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汉代以后，这种说法几乎占了统治地位。关于孔子作十翼的问题，《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汉代以后，孔子作十翼的说法，也就成为定论了。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的关于易学的儒家道统。

对于历史上这样传统的说法，宋代的欧阳修首先对于孔子作十翼提出了疑问。清代的崔述进一步地说明了十翼并非孔子所作。到了近代，维护儒家道统的人，继续倡导历史上的传统的说法。例如，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一书里，重申了伏羲作八

卦，文王重为六十四卦，孔子作十翼的说法。而反对儒学道统的人，则反对这种传统的说法。例如，古史辨派就写了许多文章来否定这种传统的说法。对于历史上这种传统的说法，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呢？今天，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采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应该承认中国历史上这种传统的说法，有其不可信的一方面；也有其合理的一方面。这就是说，“人更三圣”的说法虽然未必可信，而“世历三古”的说法则是确然无疑的。所谓“世历三古”，无非是说《周易》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种说法应该说是符合《周易》发展的历史实际的。

首先，关于伏羲画八卦的问题。伏羲氏是古代传说中的原始氏族社会的首领，说八卦为伏羲氏所画，目前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足以证明这一点。从辽宁省凌源县牛梁河母系原始氏族社会遗址的考古发掘来看，在母系原始氏族社会里，已经有了象征天圆地方的祭神的殿堂。这种建筑有些类似后来的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的明堂。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天圆地方的观念。这种观念如我们在本书第二章所指出的，正是八卦产生的思想基础。如果考虑到在原始氏族社会普遍地存在着卜筮活动这一事实，那么，应该说八卦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是完全可能的。说伏羲画八卦，不可信；说在原始氏族社会已经有了八卦，则是可信的。

关于文王重卦和周公作爻辞的问题。文王和周公是周王朝开国的君臣，他们对于周代王权的建设做出过重大的贡献，这是事实。但是，说文王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周公作爻辞，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我国社会到了殷周时代，已经进入了奴隶制社会的发展阶段。根据文献记载，在殷周时代，随着国家政权的巩固和发

展，在奴隶主贵族的国家政权内部，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官员来掌管卜筮活动。根据甲骨卜辞的记载，殷王朝就设置有卜筮的官，《周礼·春官·太卜》记载，太卜以下设有卜师、龟人、占人、筮人、占梦、眡浸、大祝、小祝、诅祝、司巫、男巫、女巫等官职，专门掌管卜筮有关的活动。与此同时，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卜筮活动的方式、方法和内容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另一方面，在现有的《周易》一书的卦、爻辞里，仍然保存着一些反映殷末周初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的辞条。例如：

泰六五爻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归妹六五爻辞：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随上六爻辞：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享于西山。

大壮六五爻辞：丧羊于易，无悔。

旅上九爻辞：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晋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明夷六五爻辞：箕子之明夷，利贞。

既济九三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未济九四爻辞：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邦。

既济九五爻辞：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爻辞，都是殷周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史实的记述。总括上述两个方面可以看出，殷周时代既有专职的卜筮机构和官员，又有完整的卜筮的爻辞，这说明当时的卜筮活动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和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是十分可能的，不过，这不一定是由文王或周公完

成的，而可能是由当时掌管卜筮的官员完成的。基于这样的分析和判断，我们可以说《周易》一书在殷周之际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不过，它远不如现存的《周易》一书这样完善。

《周易》一书在殷周之际以后，有过进一步的丰富、完善和发展，它的最后完成当在战国中晚期。这一点从《周易》卦爻辞所包含的内容，就可以看出来。《周易》一书在内容上，如本书第五章、第六章所揭示的，它的卦、爻辞是以日、月、五星和二十八宿的星象为基础构架起来的。《周易》既然以日、月、五星和二十八宿的星象为框架来构筑自己的体系，那么，我们考察一下古代人对于日、月、五星和二十八宿的把握和认识过程，自然也就可以判断《周易》一书形成的年代了。

在我国古代的文献里，二十八宿的名称最早出现在《周礼》一书里。《周礼·春官》记载说，冯相氏掌“二十有八星之位”，《周礼·秋官》也提到“二十有八星之号”，遗憾的是二十八宿都包括哪些星宿，《春官》和《秋官》都没有说明。《尚书·尧典》记载有四宿，即：火、虚、昴、鸟。《夏小正》记载的也是四宿，即：大火、织女、昴、参。《诗经》里提到的有八宿，即：火、箕、牵牛、织女、定、昴、毕、参。《左传》、《国语》记载的有六宿，即：辰角、天根、农祥（天驷）、龙（火）、天庙（营室）、昧（鹑火）。《尔雅·释天》记载的是十七宿，即：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牵牛、虚、定、营室、东壁、奎、娄、昴、毕、柳、昴等。《礼记·月令》记载的是二十五宿，即二十八宿中，只缺箕、昴、张三宿。只是到了《吕氏春秋》一书，才有关于二十八宿的完整记述。汉代以后，则有《淮南子》和《史记》二书记述的比较完备。

另一方面，从天文学著作发展的情况来看，在殷代和西周

时期，我国天文学的发展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有关天文和星象的记述，都是写在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里面，没有专门的天文学著作问世。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便有楚人、天文学家甘德著《天文星占》八卷；魏人、天文学家石申著《天文》八卷等专门的天文学著作出现。其中，在《天文》一书里，石申不仅列举了二十八宿的名称、方位，而且指出了各星宿的距离和去极度。这说明到战国中期，我国古代天文学的成就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这时对于日、月、五星和二十八宿的认识和掌握已经了如指掌。这为《周易》一书的最终完善打下了基础。

现在，让我们再进一步考察一下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战线的形势。《韩非·饰邪》说：“凿龟数策，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赵也。凿龟数策，兆曰：‘大吉’，而以攻赵者，燕也。……初时者，魏数年东乡攻尽陶、卫，数年西乡以失其国，此非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数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数年在东也。故曰：龟策鬼神不足举胜，左右背乡不足以专政。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吕氏春秋·明理》说：“故至乱之化，君臣相贼，长少相杀，父子相忍，弟兄相诬，知交相倒，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纪，心若禽兽，长邪苟利，不知义理。其云状有若犬、若马、若白鹄、若众车，有其状若人，苍衣赤首，不动，其名曰天衡。有其状若悬梯而赤，其名曰云梯。有其状若众马以斗，其名曰滑马。有其状若众植华以长，黄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旗。其日有斗蚀，有倍僂，有晕珥，有不光，有不及景，有众日并出，有昼盲，有霄见。其月有薄蚀，有晖珥，有偏盲，有四月并出，有二月并见，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有月蚀星，有出而无光。其星有荧惑，有彗星，有天棓，有

天樽，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有贼星，有斗星，有宾星。其气有上不属天，下不属地，有丰上杀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春则黄，夏则黑，秋则苍，冬则赤……国有此物，其主不知惊惶亟革，上帝降祸，凶灾必亟。其残亡死丧，殄灭无类，流散循饥无日矣。”尽管韩非和《吕氏春秋》作者的立脚点不同，但是，从这两段文字所叙述的情况可以看出，战国中晚期以卜筮或天象、星象来判断吉凶的事情极其盛行；以天象或星象来判断吉凶的思想，在人们的头脑里是普遍地存在着的。当然，这种思想和活动并不是从这时才开始有的，而是早在殷、周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只是到了战国中晚期，人们在宗教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以当时天文学所取得的成就为契机，使这种思想活动达到了高潮而已。

在殷周之际已经初具雏型的《周易》一书，到了战国中晚期，在当时天文学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以上述的社会思潮为背景，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完善和补充。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随便举一个例子，譬如说，随卦。随卦的卦爻辞是：随、元、亨、利、贞、无咎。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六二，系小子，失丈夫。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九五，孚于嘉，吉。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随卦，就其星象来说，为处士星。随卦六爻所表述的，是士大夫做官、交友、得利、受奖、处困境等情况。这一星象属于二十八宿之一，这在殷周之际，是人们所没有认识到的；就文字来说，“官有渝”、“出门交有功”等，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行文方式，这和《尚书·盘庚》比较起来，在文字风格上迥然不同；就内容来说，随卦的卦、爻辞所反映的士大夫的生活，也和殷周之际的士大夫的生活不同。因此可以肯定地说，